

# 叠数节庆与货郎经济

◆ 田兆元

一到2019年的12月，双十二的广告就开始大潮涌动。这是一年最后一次日月叠数节庆，商家竞逐这场年终大餐。

也许人们听说过“花粉节”“米粉节”，但是哪一天呢？记不住。双十二，好记，易传播是一大优势。好处，利益是节日存在的前提。今天，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紧紧抓牢了现代人钱包的叠数经济的民俗学来源。

我们发现节庆往往是日期数字的叠合，每逢日月数字叠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节日到来了。新年之正月初一，实际上就是一月一日，是一个新年开始，全民族的隆重的节日。二月初一却不是节日，但是二月二龙抬头是中国的龙节。同理，三月三上巳节，是青春的庆典。五月五端午节，六月六数不清的节日挤在这一天，七月七乞巧节，九月九重国庆节。日月叠数节庆是中国人的华彩时间，民俗学定义民俗为“生活的华彩乐章”，有一个依据就是

叠数节庆。

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日月叠数为节日呢？简单的原因是叠数便于记忆，便于传播。叠数具有巧合意味、新奇感，叠数的趣味性强。中国崇尚偶数，好事成双，叠数本身就具有吉祥意味。还有，叠音具有韵律感。

中国的主体纪年改用西方历法后，极具创造活力的中国人另辟蹊径，将尚未开拓的两位数日月叠数发掘出来，这就有了“11.11”。2013年，阿里将“双十一”注册成为商标。到2019年的双十一，阿里巴巴当天销售额达到了2684亿元，使“双十一”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购物节。

日月叠数日子是经济能量巨大的品牌，是一个经济的平台。依照经济民俗学的观点，民俗节日是重要的消费时间，节庆给了人们消费的理由。以民俗的方式开拓出节庆，拿日月叠数形式构建出一个独特时间。他们将传统农历的叠数节庆时间渗透到阳历的叠

数时间，占有了稀缺资源。阿拉伯数字双11与光棍的高度相似性与可识别性，通过现代传播方式的助力，民众形成了神速认同。认同性经济是民俗经济特质，这种认同性不仅是一种商业发动，而且是一种莫名的好运的期盼，一种共同行为的相应，成为社会互动的机缘，这就滋生了民俗互动、社会交往的成本和消费，民俗借助消费得以运转，这就是传统社会的生态机制与经济循环发展的规律。

发动这次节庆革命的是网络经济，而不是现代商业企业，这就让人陷入误区：网络经济是新经济。要是这样理解就可能走向错误的方向。网络经济并不是朝向了新的方向，恰恰相反，电子商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向传统的回归——这就是中国传统的货郎经济。

货郎在传统社会里奔走于穷乡僻壤，送货上门，对于沟通买卖双方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货郎就是重要的流

动商业的信号。货郎担就是一个挑在担子上的“百货公司”，也是“一个人的物流公司”。历史上，很多绘画描述了角色的多彩形象。很多的民歌情歌，都不会缺少货郎这一角色。货郎经济是中国传统商业经济的灵魂。货郎经济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元素。山西的《绣荷包》、湖北的《黄四姐》都有丰富的货郎故事。“货郎我把鼓播，四姑娘把手招，要针线绣荷包，你要的东西啊我知道。”这些男女情韵，蕴含了深刻而又基本的商业民俗交易原理：送货上门。

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商铺的繁荣，交通的改变，货郎这位“行商”逐渐被“坐贾”替代了。现代商业模式把行商坐贾的双向模式破坏了。电子商务为何突然崛起？它的本质问题，除了支付便捷，选择广泛，就是变回“货郎经济”模式，即送货上门。成千上万的快递小哥，其实是货郎的化身。网商与物流公司结成联盟，或自建物流网络，实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 属于弗洛雷兹的沸腾夜

◆ 任海杰



2019年的最后三个月，有五位国际大牌歌唱家云集沪上，高潮迭起：10月5日和25日，捷克女高音格魯貝洛娃、美国女高音弗莱明分别在上交音乐厅；10月18日，罗马尼亚女高音乔治乌在共青森林公园；10月20日，阿根廷男高音何塞·库拉在东方；12月8日，秘鲁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在上海大剧院，奉献了一场盛况空前、令人难忘的独唱音乐会，是夜全场沸腾，大剧院犹如欢乐的海洋。

这场独唱音乐会，正式曲目12首，返场7首，一共是19首。这样大的量在当今歌唱家的独唱音乐会上很少出现，何况弗洛雷兹三天前已经在深圳举办了一场。当然，数量的多少与曲目的分量有关，对此弗洛雷兹有精心布局。他上半场一开始先演唱了两首罗西尼艺术歌曲《告别维也纳》、《我将无声地哭泣》，轻歌慢吟，预热嗓子。接着唱最拿手的多尼采蒂的两首咏叹调：《军中女郎》里的《偷洒一滴泪》、《拉美莫尔的露琪亚》里的《先祖的墓穴》，再接着过渡到他后来发展的角色——威尔第《阿蒂拉》中的《悲痛》和《茶花女》中的《沸腾的心灵》，循序渐进，将音乐会推向第一个高潮。

下半场弗洛雷兹也是这样的思路，一开场连唱三首莱哈尔轻歌剧中的唱段，他就是母亲的酒吧里弹吉他唱民歌，被人发现了歌唱天赋。有趣的是在演唱这些民歌时，弗洛雷兹自言自语，并不时飙几下多尼采蒂《军中女郎》中那标志性的高音C，似乎是在吊观众的胃口，也似乎是在告诉观众，今晚不唱完整的高音C，就飙几个给你们过过瘾吧。观众似乎也心领神会，掌声一片。

到后台放下吉他，弗洛雷兹与钢琴家再次走到舞台中央，返场献演第四曲《格拉纳达》。凭感觉，弗洛雷兹今晚不可能如三天前在深圳那样返场六首，因为他似乎已略显疲惫，因此，当他返场演唱第五首《今夜无人入睡》时，感觉音乐会就此要结束了——转折很可能出现在这时，因为这首咏叹调中间有一小段合唱过门，而舞台上又没有合唱队，于是弗洛雷兹示意观众哼唱，哪晓得观众席里有许多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们和热爱观众齐声合唱时的能量远超一般的合唱队，山呼海啸般地烘托出弗洛雷兹最后的辉煌高音：弗洛雷兹一定被如此壮观的场面感动了，于是再次返场唱了一曲威尔第《人善变》。这样，与深圳那场持平，返场六首，心满意足，全体起立，鼓掌欢呼，准备离场。依依不舍中，观众仍不歇欢呼鼓掌，想再看一眼弗洛雷兹。过了好几分钟，已经有人离场了，突然，大剧院舞台边门又一次被推开，弗洛雷兹与钢琴家再次走上舞台，高潮中的高潮迸发——《军中女郎》中的《欢乐的日子》，弗洛雷兹最标志性的九个清脆、漂亮、辉煌的高音C！

最后必须要提一下钢琴伴奏文森索·斯卡莱拉，这位非常资深的艺术指导、钢琴伴奏者，在本场音乐会上甚至起到了导演作用。如果说弗洛雷兹是红花，斯卡莱拉就是定海神针般的绿叶。他不仅在伴奏时丝丝入扣、细腻入微地衬托弗洛雷兹，而且独奏曲目也是别出心裁——都是歌剧作曲家贾里尼、威尔第、多尼采蒂、马斯奈的优美钢琴小品，平时难得一听。短短几分钟，既让弗洛雷兹有短暂休息时间，又不过分冗长，喧宾夺主。

现物流的智能化。货郎（送货员）通过对特定线路和对顾客货物的配送，其效率自然比顾客到商场购物的效率要高，因此大幅度提升了商业效益。

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在考察现代市场过程中，发现市场社会的很多问题，如纠纷仲裁、产权传承等问题，很多情况下还是要依赖习俗。线上信用交往的成本和消费，民俗借助消费得以运转，这就是传统社会的生态机制与经济循环发展的规律。

发动这次节庆革命的是网络经济，而不是现代商业企业，这就让人陷入误区：网络经济是新经济。要是这样理解就可能走向错误的方向。网络经济并不是朝向了新的方向，恰恰相反，电子商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向传统的回归——这就是中国传统的货郎经济。

货郎在传统社会里奔走于穷乡僻壤，送货上门，对于沟通买卖双方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货郎就是重要的流

动商业的信号。货郎担就是一个挑在担子上的“百货公司”，也是“一个人的物流公司”。历史上，很多绘画描述了角色的多彩形象。很多的民歌情歌，都不会缺少货郎这一角色。货郎经济是中国传统商业经济的灵魂。货郎经济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元素。山西的《绣荷包》、湖北的《黄四姐》都有丰富的货郎故事。“货郎我把鼓播，四姑娘把手招，要针线绣荷包，你要的东西啊我知道。”这些男女情韵，蕴含了深刻而又基本的商业民俗交易原理：送货上门。

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商铺的繁荣，交通的改变，货郎这位“行商”逐渐被“坐贾”替代了。现代商业模式把行商坐贾的双向模式破坏了。电子商务为何突然崛起？它的本质问题，除了支付便捷，选择广泛，就是变回“货郎经济”模式，即送货上门。成千上万的快递小哥，其实是货郎的化身。网商与物流公司结成联盟，或自建物流网络，实

时，他就是母亲的酒吧里弹吉他唱民歌，被人发现了歌唱天赋。有趣的是在演唱这些民歌时，弗洛雷兹自言自语，并不时飙几下多尼采蒂《军中女郎》中那标志性的高音C，似乎是在吊观众的胃口，也似乎是在告诉观众，今晚不唱完整的高音C，就飙几个给你们过过瘾吧。观众似乎也心领神会，掌声一片。

到后台放下吉他，弗洛雷兹与钢琴家再次走到舞台中央，返场献演第四曲《格拉纳达》。凭感觉，弗洛雷兹今晚不可能如三天前在深圳那样返场六首，因为他似乎已略显疲惫，因此，当他返场演唱第五首《今夜无人入睡》时，感觉音乐会就此要结束了——转折很可能出现在这时，因为这首咏叹调中间有一小段合唱过门，而舞台上又没有合唱队，于是弗洛雷兹示意观众哼唱，哪晓得观众席里有许多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们和热爱观众齐声合唱时的能量远超一般的合唱队，山呼海啸般地烘托出弗洛雷兹最后的辉煌高音：弗洛雷兹一定被如此壮观的场面感动了，于是再次返场唱了一曲威尔第《人善变》。这样，与深圳那场持平，返场六首，心满意足，全体起立，鼓掌欢呼，准备离场。依依不舍中，观众仍不歇欢呼鼓掌，想再看一眼弗洛雷兹。过了好几分钟，已经有人离场了，突然，大剧院舞台边门又一次被推开，弗洛雷兹与钢琴家再次走上舞台，高潮中的高潮迸发——《军中女郎》中的《欢乐的日子》，弗洛雷兹最标志性的九个清脆、漂亮、辉煌的高音C！

最后必须要提一下钢琴伴奏文森索·斯卡莱拉，这位非常资深的艺术指导、钢琴伴奏者，在本场音乐会上甚至起到了导演作用。如果说弗洛雷兹是红花，斯卡莱拉就是定海神针般的绿叶。他不仅在伴奏时丝丝入扣、细腻入微地衬托弗洛雷兹，而且独奏曲目也是别出心裁——都是歌剧作曲家贾里尼、威尔第、多尼采蒂、马斯奈的优美钢琴小品，平时难得一听。短短几分钟，既让弗洛雷兹有短暂休息时间，又不过分冗长，喧宾夺主。

世间少有的完美之事就这样降临在上海观众面前。



对于中国人来说，“夏洛克”是个21世纪走红名字，而上个世纪人们熟悉的应该是“福尔摩斯”。夏洛克·福尔摩斯在各个国家被演绎出了五花八门的影视版本，但都没有正上映的《平原上的夏洛克》来得乡土气十足。

毫无疑问，这是2019年度最与众不同的国产片。影片创意源自导演徐磊老家亲戚的经历：人被车撞了，却没报警。因为一旦报警，就意味着不能报销医药费了，肇事司机找不到，这一大笔钱可耗不起。但是，就这样自认倒霉也太憋屈了吧！最终老人家决定：先破案，再报警。

于是，就有了《平原上的夏洛克》这个又荒诞又真实的故事。背景是河北农村，男主角超英卖掉养的牲口有了一笔钱，准备重建房子以慰藉亡妻。两个好兄弟占义、树河来帮忙，可树河却在路上被车撞了，医药费成了大问题。怎么破案抓肇事司机？两个农村大叔自力更生地当起了“土酷侦探”。某种程度上，他们之间正如同夏洛克与华生，有着超越利益的友情、信任与正义感。

他们显然没有读过任何侦探推理小说，用的方法极不专业。比如，请村里的神婆算算破案方向，弄假成真地当了顾客偷看监控录像，伪装成送外卖的混进高档小区调查……乍看还以为只是短视频，充满了让人感到发噁的“土酷”，比《哈是佩奇》还要接地气。

巨大的反差造就了笑点。宣传时，《平原上的夏洛克》被贴上了“荒诞喜剧”标签，但据说试映时，观众情不自禁发出的阵阵笑声，着实让导演吓了一跳。因为他并没打算拍什么喜剧，并不是依照观众的反应构思剧本的。

农村题材的喜剧片原本是中国影史上长盛不衰的大类，比如《咱们的牛百岁》《喜盈门》《妇女主任》等，结局几乎都是团圆的、光明的，有着善善恶分明内在逻辑。而《平原上的夏洛克》与那些农村喜剧片都不同，倒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秋菊打官司》之类的黑色喜剧片。

本质上，《平原上的夏洛克》里农村大叔和村妇秋菊一样“轴”，本性质朴善良，才会一根筋地认定死理。秋菊当年是一步步从农村走向城镇“要个说法”，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进阶，法律规则大过了乡村权力。而《平原上的夏洛克》里的农村人都是“利”字当先。他们碰到的人，甚至都没有《秋菊打官司》里那样理想正派。

轴的人，最看重的一定不是金钱。超英找真凶的目的是为了朋友的医药费，可是当有钱老板主动将封口费给他时，他又为了真相，硬是不要这笔钱，选择所有问题自己扛。

弗兰茨·卡夫卡的笔记里有这么一句：“善在某种程度上是绝望的表现。”喜剧是属于善良的小人物的，然而，绝大多数喜剧的结尾，小人物经历了千折万磨，仍旧还是一个回到原点的小人物。

这是一部没有奇迹的电影，没有强行搞笑，没有堆砌各种所谓“致敬大师”的镜头，既没有童话，也不是魔幻现实主义，当然也没有任何明星阵容。这是大多数处女作电影的特别点，《平原上的夏洛克》做得更绝，连专业演员也弃之不用了。导演非科班出身，直接让自己的父亲来演男主角超英，角色的名字就是演员的名字。这是最经济的拍法，不需要很费力地调度、打磨演员，更不需要为了安排准的戏分出妥协。

可是，这样一部不凑大众口味的电影，却奇迹般地上映了。在第13届FIRST电影展上，导演徐磊凭处女作《平原上的夏洛克》获得最佳电影文本，小成本的电影被寄予了以小博大的厚望。不过，从目前票房来看，《平原上的夏洛克》并没有创造奇迹，没有从“小人物”发迹为“暴发户”，颇符合电影本身的精神气。

《平原上的夏洛克》有两个英文名，“Rebuilding”和“Summer Detective”，显然后者更好卖些，但前者才是导演想要的名字，“重建”。

影片最有诗意的一幕发生在行将结束时，超英将金鱼倒在积了雨水的塑料顶棚上。鱼在天，人在下，隐隐透着挣扎着活下去，让这部灰扑扑的电影有了出乎意料的颜色。生活始终困苦，但人从没有放弃过，再大的打击过后也得继续往前走。

影片最有诗意的这一幕发生在行将结束时，超英将金鱼倒在积了雨水的塑料顶棚上。鱼在天，人在下，隐隐透着挣扎着活下去，让这部灰扑扑的电影有了出乎意料的颜色。生活始终困苦，但人从没有放弃过，再大的打击过后也得继续往前走。

影片最有诗意的这一幕发生在行将结束时，超英将金鱼倒在积了雨水的塑料顶棚上。鱼在天，人在下，隐隐透着挣扎着活下去，让这部灰扑扑的电影有了出乎意料的颜色。生活始终困苦，但人从没有放弃过，再大的打击过后也得继续往前走。

影片最有诗意的这一幕发生在行将结束时，超英将金鱼倒在积了雨水的塑料顶棚上。鱼在天，人在下，隐隐透着挣扎着活下去，让这部灰扑扑的电影有了出乎意料的颜色。生活始终困苦，但人从没有放弃过，再大的打击过后也得继续往前走。

影片最有诗意的这一幕发生在行将结束时，超英将金鱼倒在积了雨水的塑料顶棚上。鱼在天，人在下，隐隐透着挣扎着活下去，让这部灰扑扑的电影有了出乎意料的颜色。生活始终困苦，但人从没有放弃过，再大的打击过后也得继续往前走。

影片最有诗意的这一幕发生在行将结束时，超英将金鱼倒在积了雨水的塑料顶棚上。鱼在天，人在下，隐隐透着挣扎着活下去，让这部灰扑扑的电影有了出乎意料的颜色。生活始终困苦，但人从没有放弃过，再大的打击过后也得继续往前走。

# “南方车站”里的现代叙事与东方诗意

◆ 崔轶

《南方车站的聚会》像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黑色小说，胡歌饰演的社会边缘人物周泽农因在小偷聚会中的械斗而错杀了警察，于夜色中开始了一场逃亡之旅。周泽农想要在南方车站再见一下五年未见的妻子杨淑俊（万茜饰演），但等来的却是陪泳女刘爱爱（桂纶镁饰演），周泽农计划让妻子来举报自己换取警方悬赏的30万元奖金，但刘爱爱的出现让事件复杂起来。在次序交错、鱼龙混杂的干湖城中城，粉色的霓虹下，错乱的棋牌室、地下室、桌球房……无性一次次陷入迷茫、挣扎、报复、反悔，在善与恶之间，导演刁亦男用诗意的镜头调度聚焦了边缘人物的世界。

从剧本构思到影像调度、视听语言、演员的诗意身体表达，这部电影有极大的创新与东方意蕴的呈现。从叙事视角而言，《南方车站的聚会》是部多视角的电影，从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开始，周泽农向刘爱爱讲述自己为何杀人，确认自己罪犯身份为第一个叙述视角，而后刘爱爱讲述周泽农的太太杨淑俊没有来见他的原委为第二个叙事视角，两个对于过去时空的叙述占去了影片大部分的时间。周泽农与刘爱爱所处的当下时空，到故事的进展至周泽农报仇与最终被警察枪杀为叙述的第三个视角，最后一个视角则由廖凡所饰演的刑警队长提供。四个视角相互交错，使得影片在叙事过程中凸显了主题即人性在真实与谎言中的考量，在善恶之间的徘徊，在道义与欲望之间的挣扎。有别于好莱坞的类型模式与消费影像，亦冲出了中国电影电视剧化的迷谷，本片的

现代性艺术化表达是为中国电影艺术当代性的一次有力回应。刁亦男此次的突出表现还在于其利用高超的调度手段赋予了电影东方诗意的风格呈现。武汉城中城是中国的一个三四线小县城的代名词，在自然与水泥之间，在弥漫着霓虹气息的割裂空间中，在黑夜的动物园里，在棚户区中，刁亦男导演用空间分割着时间的蔓延，用镜头引领着观众走向人物内心，思考个人生命价值。中国的电影故事对英雄的悲剧式落幕总有一种无限的歌仰与缅怀。这种社会边缘人物的英雄化是非常东方式的表达，是中国观众所熟悉的侠义精神与道义归宿，是导演赋予周泽农的世俗隐喻。周泽农的几段暴力打斗更像一场场华丽的动作舞蹈，力量与道具配合着胡歌的肢体与步伐，像是演员同摄影机之间的华尔兹，水泥墙上光影交错、霓虹灯下剪影婆娑。在自然的社会噪音与京戏京剧的映衬下，已很难分辨客观声响的存在与人物内心心理的回响。导演刁亦男利用错位与颠倒时间元素，赋予影片叙事具有当代性的视觉体验，同时又利用城中城的空间关系来展示故事载体的立体性和多面性，这种利用解构的方式来讲述电影故事的方式，具有东方式的原创性，实为难得。

影片中第一个悬念是周泽农要见妻子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到了故事的中段才得到了答案，原来是希望自己的妻子来举报自己而得到警方的悬赏，随之而来的悬念是刘爱爱等人对悬赏的态度是什么？周泽农在极端环境下

## 愿母亲们活出自我——从金智英、里沙子、塔莉经历的“母职惩罚”说起

◆ 秦玉兰

“我现在很可能会因为生了孩子而失去青春、健康、工作，以及同事、朋友等社会人脉，还有我的人生规划、未来梦想等种种，所以才会一直只看见自己失去的东西，但是你呢？你会失去什么？”

《坂道上的家》展现的是母亲的群像，由一起母亲溺毙8个月孩子的案件引发，女主角里沙子意外被选为案件陪审员，需要多次出席旁听庭审并发表看法。她不得不将女儿送到丈夫郑代贤提出的、小说作者赵南柱出生于1978年，她驾轻就熟用大量的细节描摹了女性在被孕育的那一刻开始可能遇到的困境，当然，最大的困境在成为母亲之后。小说以白描为主，显得冷静克制，在每个章节后面还会添加了解释，用数据的方式进行反证，令人仿佛遭遇严谨的学术论文，但这不妨碍这本小小说流畅好读。

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依然备受瞩目。两位主演孔侑和郑裕美在《熔炉》和《釜山行》之后第三次合作，电影在今年秋季上映后，引发了韩国全民大讨论，不同性别观众对该片的评分两极分化之严重，男性评分极低，女性评分极高。在电影版、影评版之外，还有冷僻冷僻，在每个章节后面还会添加了解释，用数据的方式进行反证，令人仿佛遭遇严谨的学术论文，但这不妨碍这本小小说流畅好读。

简单地认为是“男主外、女主内”具有合理性的思想造成了日韩两剧中的女性生存困境，恐怕有失偏颇。这并不是区域文化的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

2018年的美国电影《塔莉》与《82年生的金智英》的相似度甚至比《坂道上的家》更高。《塔莉》由塞隆主演，影片中她疲惫尽显，风姿不存。她是三个孩

如何取信她的话语？除了警察还有谁置周泽农于死地？周泽农又如何复仇？周泽农同刘爱爱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关系？最终周泽农被谁出卖了，他又将怎样死去？这一系列的悬念，常规匪匪类电影中类型化的处理固然能强行地让观众被情节吸引，但刁亦男则选择了更高级的表演调度，用身体语言来呈现角色的状态。

胡歌饰演的周泽农话语不多、台词简短，洗脱了明星气质，更多地用眼神来展露底层人的内心世界，消瘦的身体下是劲爆的肌肉和经过训练的形体，出手狠准，气贯眉间，侠义与仁恒都凝结在瞬间的表情之中。周泽农挨了子弹血雨腥风骑行而错杀巡警的主观视角、野鸭滩夜间氤氲密布的孤鸟上与刘爱爱的暧昧、藏匿处自行包扎枪伤、小面馆吃面的特写……情绪可被多层解读，给予观众想象与满足。这也是作为导演对于诗意调度的理解，突出以表演为载体，亦凸显出电影作为艺术的哲学意义。

《南方车站的聚会》是唯一一部入围今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正如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福茂的评价：“电影没有拘泥在中国电影的传统中，而是对黑色电影和警匪电影在美学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中国电影正在工业化和产业化的进程中，我们期待有更多的致力于创新艺术手法的电影问世，让中国观众在大量的类型电影外感受到现代电影的美学价值，提升中国观众影像审美能力，为创造出更绚丽的东方电影美学继续往来。

无独有偶，日本今年4月也推出了一部《看似平淡、实则惊心》的电视剧《坂道上的家》，同样改编自同名小说，讲述的也是女性养育儿子的困境。

《坂道上的家》展现的是母亲的群像，由一起母亲溺毙8个月孩子的案件引发，女主角里沙子意外被选为案件陪审员，需要多次出席旁听庭审并发表看法。她不得不将女儿送到丈夫郑代贤提出的、小说作者赵南柱出生于1978年，她驾轻就熟用大量的细节描摹了女性在被孕育的那一刻开始可能遇到的困境，当然，最大的困境在成为母亲之后。小说以白描为主，显得冷静克制，在每个章节后面还会添加了解释，用数据的方式进行反证，令人仿佛遭遇严谨的学术论文，但这不妨碍这本小小说流畅好读。

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依然备受瞩目。两位主演孔侑和郑裕美在《熔炉》和《釜山行》之后第三次合作，电影在今年秋季上映后，引发了韩国全民大讨论，不同性别观众对该片的评分两极分化之严重，男性评分极低，女性评分极高。在电影版、影评版之外，还有冷僻冷僻，在每个章节后面还会添加了解释，用数据的方式进行反证，令人仿佛遭遇严谨的学术论文，但这不妨碍这本小小说流畅好读。

简单地认为是“男主外、女主内”具有合理性的思想造成了日韩两剧中的女性生存困境，恐怕有失偏颇。这并不是区域文化的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

2018年的美国电影《塔莉》与《82年生的金智英》的相似度甚至比《坂道上的家》更高。《塔莉》由塞隆主演，影片中她疲惫尽显，风姿不存。她是三个孩

子的母亲，天天累成狗，被生活折磨得体力无完肤。终于她迎来了万能保姆塔莉，什么事情都能帮她搞定，直到有一天塔莉说要离开，两人开车回家路上发生车祸，奇怪的是落水之后的车子里并没有塔莉的身影，而她入院时，丈夫办理手续被问及她婚前的姓氏，正是塔莉。原来，保姆根本不存在，只是精神压力过大，幻想出未婚的年轻的自己，所有那些“塔莉”完成的家务以及遭遇的劳心费神的熊孩子事务，全是她一个人的独角戏。

养育是世界性的问题，衍生出当今社会学两个概念：“母职惩罚”与“父职奖励”：抚养孩子不是业余爱好，也不是玩换装玩偶，男人也不会来帮你，不管遇上什么都要自己加油，但是那样的日子很快就会被熬过去的，之后就轻松了，什么神经衰弱、都是骗人的。”年轻女性对年轻母亲的苛责，更令人窒息。里沙子终于在庭审中找到了关键点：案件中的母亲所寻求的，不过是真正的理解而已。

最近，连甄子丹都上了《吐槽大会》。

当然了，他是来为新电影做宣传，但是要做什么宣传也不用跟自己的嘴皮子过不去是不是？普通话还没有溜到说段子的甄子丹，说：“这是我最想‘动手’的一次。”返台剧本写手王建国“瑟瑟发抖”，自觉：动嘴你不行，动手我不行，不写好台本谁都不行。好在最后甄子丹顺利拿下自己的脱口秀首秀，众人皆大欢喜。

《吐槽大会》已经到了第四季，这档网络综艺节目能够走红，靠的就是段子手前赴后继写出好台本，然后各路明星背得滚瓜烂熟后爆笑全场。做《吐槽大会》，一开始李诞也有顾虑，怕吐槽太狠，嘉宾接受不了，闹出不愉快。但合作下来，出乎他预料地顺利。当然，吐槽不是在有沟通的前提下临时吐槽，《吐槽大会》的幕后有许多编剧，每次邀请到一位被吐槽的主要嘉宾之后，他们都会翻阅和他相关的资料，包括微博、知乎、论坛等等，找出需要的梗来写“台本”。除了李诞和池子是自己创作之外，每个到场的表演者都有写手为他准备台本。在录制之前要提前彩排。

所以不管是谁李小璐笑侃亲手毁掉璀璨星途的自己，还是李诞对国足不敌叙利亚的吐槽，每次都精准戳中了观众的笑点。《吐槽大会》的特色就是新“槽点”满满，又要恰到好处，这就要看段子手的功力了。难就难在让明星说段子，还能说得像他自己随口说出来的，其实很不容易。

在一个需要微笑大笑乃至爆笑来释放压力的时代，也算恰逢其时。脱口秀市场的真空，正被《奇葩说》《吐槽大会》《晓说》等新兴势力瓜分。看起来，中国脱口秀迎来了春

天。短短一两年时间，中国脱口秀从边缘的小众文化，变成了各大平台版权的香饽饽。

这些脱口秀的共同特点是年轻。1990年出生的李诞现在已是网上和业界的红人，2013年东方卫视着手准备《今晚80后脱口秀》节目时，他才算正式步入了脱口秀行业，那年他23岁。在东方卫视做了一年之后，李诞和他的朋友决定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去做内容提供商，这才有了《吐槽大会》的横空出世。《奇葩说》领衔的马东、蔡康永、高晓松等人虽然都是老江湖，但是他们捧红的姜思达、傅首尔等一众辩手，完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类型。以伶牙俐齿著称的蔡康永，纵使岁月不饶人，也有一颗少年心。节目选择时下流行的辛辣话题，这些话题也通过网友的共鸣引发社会讨论。如：“看脸有罪吗？”“相亲就该AA制”“消灭份子钱”等多个话题轻而易举地位列微博话题榜前茅，搜索量居高不下。当年《奇葩说》开播未满8周，视频播放总量已经轻松破亿，以一档新生网络综艺的姿态超越“前辈”，成了综艺黑马。

高晓松呢，一个人就撑起一台戏。看得多，走得远，见多识广，再加上是北京人，天生会侃。在《晓说》里，高晓松侃历史、评人物、聊八卦、论文化、谈热点，高接低挡，好像就没什么不知道的事，所谓谈万卷书，行万里书，“知道分子”高晓松算是做到了。

高晓松式的脱口秀难以复制，需要学识的积累，当年事已高的高晓松宣布结束《晓说》，脱口秀的市场，就更不是少年英雄的天下了。

观众需要笑声，中国脱口秀的春天需要新鲜血液，需要新的笑点，李诞们道阻且长。



## 中国脱口秀的新人